

中國歷代思想家（六）
更新版

主編者：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
王壽南

臺灣商務印書館

何啓民 林麗真 尤信雄 黃錦鋐
藍吉富 田博元 莊宏誼

著

嵇康·王弼·葛洪·郭象·道安
慧遠·竺道生·寇謙之

中國歷代思想家(六)

嵇康 王弼 蔡洪 郭象 道安 慧遠 章道生 寇謙之

定價新臺幣二八〇元

主編者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
王壽南

著作者 何啓民 林麗真 尤信雄 黃錦鉉

責任編輯 藍吉富 田博元 莊宏韻

封面設計 雷成敏

張士勇

內頁繪圖 黃碧珍

校對者 許素華 陳寶鳳 羅名珍

印 刷 所 者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電話：（02）2311-1611-18

傳真：（02）2237-1027-4

郵政劃撥：○○○○一六五一號

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北市業字第993號

• 一九七八年六月初版第一次印刷
• 一九九九年四月更新版第一次印刷

嵇康·王弼·葛洪·郭象·道安·慧遠·竺道生
·寇謙之 / 何啓民等著。--更新版。--臺
北市：臺灣商務，1999[民88]
面；公分。--(中國歷代思想家：6)
含參考書目
ISBN 957-05-1572-4 (平裝)

1. 哲學 - 中國 - 傳記

120.99

88002828

嵇康

何啓民 著

目 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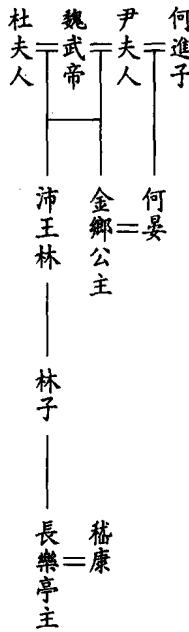
一、嵇康傳略	005
二、嵇康思想的背景	009
三、嵇康的思想	018
四、嵇康對當時及後代的影響	028
五、嵇康傳世的著作	030
參考書目	034

嵇康

一、嵇康傳略

嵇康，字叔夜，譙國銓縣（安徽省滁縣境）人。關於他的姓氏，傳說很多。有的說，嵇，本姓奚，由於避怨，從會稽上虞（浙江省上虞縣），搬遷隱居於銓縣的嵇山旁，才改爲嵇氏的。不僅他的姓氏，就是他的家世，也撲朔迷離，不太清楚。我們從殘存的嵇氏譜中，知道他的父親是嵇昭，字子遠，官督軍糧，治書侍御史，這在漢魏間，是一官品第六已上，內掌舉劾，並分掌侍御史諸曹，出則督導平州郡盜賊，運漕及軍糧事，是一清貴的職位。而《元和姓纂》則稱後漢太子嵇蕃，字茂齊，生含，廣州刺史，武昌，生康，魏中散大夫，生紹，晉侍中，更是謬誤百出。因爲嵇蕃只是嵇紹的從兄，嵇喜之子，而嵇喜則是嵇康之兄。從這些記載中，我們可以了解到嵇康家世是不會很高的。即使他的父親真是督軍糧、治書侍御史的嵇昭，對他也沒有多少的影響，因爲嵇康生於魏文帝黃初四年（西元二二三年），很早就做了孤兒，靠了母親孫氏，及兄嵇喜的養育之下，才逐漸長成。一方面，由於嵇家經濟

環境尚不太差，再則母兄念他從小是孤兒，故而對他是寵愛有加，百依百順。他們本是儒世家，這在當時，是一個相當普遍的情形。而嵇康又從小就是天資聰慧，超出凡童，個性又強，不理會別人的批評和想法，雖然沒有經過名師的正規教導，卻是博聞強記。他不僅學問好，而且形貌不凡，身長七尺八寸（當今一·八八六公尺，或六·一八呎），風姿特異，見到他的，莫不稱譽不止。然而他的個性，是不講究別人如何看待的，隨便任性，聽其自然，不加任何修飾，卻更顯出他的純真。以他各方面的傑出不凡，故而他雖不追求名譽，而名譽卻自己來了。不知是否這些條件的具備，被選為魏的長樂亭主婿。長樂亭主，是沛穆王林的孫女，嵇康乃一變而成爲魏親戚，與何晏也成了親戚，他們之間的關係，有如左圖：



這次婚姻，對於嵇康的未來，是一個重要的關鍵。因爲景初三年（二三九年）春，明帝崩，太子芳立，曹爽秉政，何晏進用。而明年爲正始元年（二四〇年），時嵇康方十七歲。考嵇康之女生於正始十年（二四九年），可以推算嵇康之結婚，及因此而被選爲郎中，拜中散大夫，莫不在正始的十年間。因爲嵇康所做的這兩個官，郎中，比三百石，第八品，無員；中

散大夫，六百石，第七品，無員，皆爲冗散閒官，無職事，可以看出來這全然是由於嵇康與魏宗室婚姻的結果。就嵇康短暫的政治生涯來說，事功是談不到的。可是由於他本身所具備的優越條件，成爲當代最具吸引力的青年才俊，爲世人所共仰，當然不少仰慕他的人，而嵇康的交往是有選擇性的，終其一生（二三三三—二六二年），有紀錄可考的，不過阮咸、劉伶、王戎、山濤、公孫崇、趙至、袁準、山欽、阮籍、孫登、郭遐周、郭遐叔、阮德如、張叔遼、呂巽、呂安、向秀等十七人。至交，更只有二郭、阮德如、呂安、向秀等三五人。由於他是如此的自高身價，傑傲不羣，又處在一個政爭最爲激烈的時候，自然容易因得罪人而爲人中傷，難以保持他生命的安全了。

正始十年春正月，太傅司馬懿乘大將軍曹爽兄弟隨帝朝高平陵，帶兵先據武庫，屯洛水浮橋，發動一次奪權的政變。政變獲致完全的成功，曹爽、何晏等並被殺害。嵇康亦因此辭官而去，閒居不出，幾乎有十三年的時間（二四九—二六二年），與他有往來的，不過前述十七人中的一部分，而他活動的地區，也不過是河東（山西夏縣北）、潁川（河南禹縣）、汲縣（河南汲縣），居住較久的，則是洛邑（河南洛陽）和山陽（河南修武）。嵇康的家族既非豪富，做官又不久，而且官位不高，收入不會很多，在任時固然可以維持，卻又不能長期賦閒，故而在正始十年以後閒散的十三年時間，毫無疑問地，境遇必然是很困難的。他多才多藝，能鍛鐵，常鍛鐵以排遣這段難過的日子，表露出他孤寂的心境，卻始終沒有用它視爲獲取生活之資的意思。當時大將軍司馬師極爲寵信的鍾會，曾帶了大批的隨從，志得意地前去探視嵇康，嵇康只顧自己鍛鐵，不理會鍾會的來到。鍾會乘興而來，沒有料到落得如

此地掃興，將去，嵇康問鍾會：「聽到了什麼而來？見到了什麼而去？」鍾會回答說：「是聽到了什麼而來，也看到了些什麼而去。」嵇康在正始十年以後，既絕望於政途，對當權的司馬氏作消極的抗議，只想過過清貧的日子，教養教養子孫，與親友往來敘敘舊情，酒一杯，琴一曲，也就心滿意足了。所以山濤推薦他來接替自己的職位時，卻收到了他的絕交書，除了表白他不適於做官外，更聲稱他時常非薄湯、武、周、孔，以譏刺當道。由於他的處世態度太令當道失望，遂而假借他好友呂安的事件，將他牽連在內。鍾會在朝廷公開指責他說：「今日皇道開明，四海歸心，風俗醇厚，邊遠之區，沒有不順的頑民，街巷之中，也沒有不滿的議論。只有嵇康這個人，上不肯臣服於天子，下不肯侍奉於王侯，輕薄而傲慢，不願為世界盡一分力量。既無益於社會，又傷風敗俗，過去，太公曾經誅華士，孔子也殺了少正卯，都是由於這兩個人自負他們的聰明才資，惑亂人心。而今如不殺嵇康，將會產生很壞的影響，有妨礙於統治。」遂而將他幽禁起來。消息傳了出去，數千太學生，來請求赦免嵇康。而當時才俊之士，甚且自動地願意隨他人獄。經過勸導之後，這些人才漸漸散去。這些事情發生了之後，當然更遭當道之忌。終於在常道鄉公景元三年（二六二年），嵇康被殺害，時年四十歲。

二、嵇康思想的背景

嵇康的時代（二三六——二六二年），天下雖爲曹魏所有，而內部政爭正烈，司馬氏在相當短暫的時間中，既奪軍權，再奪政權，爲了達到他最後奪取天下的野心，必須排除所有的殘餘阻力，以增加成功的機會，故而同時開始其消滅異己的努力，嵇康之終罹其禍而被殺，不過何進被殺後再一個例子而已。

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嵇康的某些思想和行爲的偏激，如同前面所提到的，在他青年入仕之初，即棄官而返回家園，鍛鐵而意不在以此爲業，飲酒而意豈在與親友暢敘舊情，既不理世務，也不事生產，山濤推薦他出來做官，卻得到他的絕交信，聲稱他的不適於做官，而又好非薄湯、武、周、孔，鍾會也批評他，說他上不肯臣服於天子，下又不肯侍奉於王侯，輕薄而傲慢，不願爲世界盡一分力量，既無益於社會，又傷風敗俗，自負他的聰明才資，惑亂人心。透過嵇康的政治背景，和當時的政治環境，對嵇康的所以如此才可以理解。

然而這些雖然關係了嵇康的政治生涯，甚至於他的生命，卻並不足以說明嵇康的全部。嵇康所帶給後世的，是有關於他的一些論著，而這些論著，才是表露出他思想中的真正重要部分。而談到這點，同樣地，須先要了解嵇康的這個時代。只是，它不再是從他的政治環

境，而是從思想方面著眼。

談到這個時代的思想家時，自然都得談到他們這個時代的思想背景。然而對每一位思想家來說，他們雖然同是生長在這一個時代，卻不能用全然相同的背景來加以解釋，每一個人都有他們各自的精神面貌，每一個人也都有他們各自不同的承襲，和他們對這一個時代的感受。因此在談到嵇康的思想背景時，自也有它必須加以強調的地方。不過就大的方面，即是任何一個這時代的思想家，都不能擺脫這一時空所加予每一個的當然影響方面來說，這也就是：從東漢一變而為魏晉的巨大變化。

話得從漢武帝（西元前一五七—前八七年）說起，他罷黜了百家，獨尊儒術，固不論他是否真的崇信儒術經學，至少在表面上，他真的是做到了這點。他並為博士設置弟子五十人，以及如弟子若干人，一年後考試，按照成績分發任用，由於這一辦法，使得漢廷不必採用強制的手段，而天下自然向風，因為他替天下打開了祿利的路子，很自然地受到社會的普遍重視。自此到西漢末年，不過一百多年的時間，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從經學大師學的，多的有千餘人，而京師太學，諸生亦有一萬餘人。王莽既以儒生而終篡漢位，儒術經學的公私傳授，到此遂而達空前的高峯。而經學的本身，亦因設置博士，立於學官，有了家法門戶，如《詩》有魯（出於申公）、齊（出於轄固）、韓（出於韓嬰）三家；《書》有歐陽（生）、大夏侯（夏侯勝）、小夏侯（夏侯建）三家，同出於伏勝；《禮》有大戴（戴德）、小戴（戴聖）二家，同出於高堂生；《易》有施（讎）、孟（喜）、梁丘（賀）、京（房）四家，同出於田何；《春秋》則為《公羊傳》，有嚴（彭祖）、顏（安樂）二家，同出於胡母生、董仲舒。

有了家法門戶，而後有了章句，用以教授弟子。而章句之末流，卻成爲煩瑣的碎辭，如前面所稱的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在如此情形下，所加予學子的，只是在章句中馳逐，迷於枝葉，而難識大體。

五經的有章句，在既有家法以後。而漢人講經，自一開始，就出於非純粹儒家的觀點，不僅大儒董仲舒如此，就是孔孟，亦多有陰陽災祥的色彩。到了東漢，由於光武帝的崇尚圖讖，爲了利祿，經師也多講圖讖，經學遂而成爲一門神秘的、混雜的、又復是煩瑣的學問，除了相互攻訐，爭論不休以外，去道日遠，去聖也日遠。

古學的出現，雖然使得經學內部的紛爭愈多也愈烈，然而它在掃除陰陽讖緯，及講求義理，不再拘泥於章句上，是有貢獻的。「古學」是對於「今學」而言的，劉歆於西漢哀帝時，欲將中秘書中古文經典，諸如《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立於學官，而後經學開始有了今古文之爭。古文經學家所講求的，是義理，而非章句。他們的反圖讖，也是很顯然的。至於經學中講陰陽五行，古學諸家所作淨化的努力，則感不夠，我們也無權要求古文經學家能徹底地做到這些，因爲這不是一時之功，且亦需要一新的環境，和極大的魄力。故對於劉歆尚講五行災異這一事實，應予以適度的諒解。因爲，即使是揚雄、王充，尚不能完全擺脫象數符瑞的思想。

就一般而論，古文經學家對於其他諸子之學，似亦較之今文經學家，抱有較寬容的態度。馬融曾注《老子》、《淮南子》，並且博通百家之言。古代思想之中，最與術數無關的，是道家。古文經學家不大講術數，非以其必與道家具有若何之關係，然而，古文經學家多有好

道家之說的，可能也是事實。或許由於經學本身的不能滿足他們，或許由於表示博學多文，導致他們對諸子之學的探討。他們用批判的眼光，看當時的今文經學，他們不講章句，他們近諸子之學，然就東漢一朝來說，「經學」始終是學術思想的主流，「今文經學」更是「經學」的正統。在一般人看來，章句雖煩瑣，究竟講的是「經」的本身；而不用章句，專講大義，則可能離經背道。因漢儒講經，不離章句，章句雖不理想，漢儒之精神卻在於是，固不能純以後代之眼光來看。而經學的真正改革，仍須從經學的內部做起，章句不一定壞，壞的只是它的末流趨於煩瑣，如能不煩瑣，則章句自也有它可取的地方。經學的改革運動，即章句的刪削，早在王莽時就已開始，浮辭雖多省減，猶有一二十萬言，且只有歐陽《尚書》、齊《詩》、嚴氏《公羊》，未見普及。到了東漢末年的鄭玄、劉表，成績較好，影響較大，然而也不過是對於漢經學的正統——章句之學，所作的最後努力，和最後的掙扎而已。

然而，章句之學一天不打倒，經學一天得不到解放；經學的權威性一天不打倒，真正的學術自由空氣一天不能出現。它雖然已到了該變的時候，如果沒有外力的影響，要它變，仍然是困難的。而逼使這根深柢固的學術思想主流變，且不得不變的，第一是董卓所引發的一連串變亂。不過十年時間，長安城固為之一空，為漢政治文化中心的洛陽，同樣因兵燹而殘破難用了。漢室君臣，被驅遷徙往來，苟息於彊敵之下，無復寧日，無暇，更無力於儒學之倡導，甚至連圖書典籍，亦一時喪失殆盡。主持、推動漢家學術思想主流經學的兩京，既遭受到如此極度的摧殘，而不是暫時性的中斷，此一變化，使天下所共仰的京師，對於地方，不再有控制、拘束，和影響力了。而促使學術思想不得不變的第二個原因，是曹操的用人政

策。董卓等之亂，毀滅了文化中心的兩京，學術思想正統的儒學，失去了領導，力量雖猛，一時尚沒有能影響到地方，基層大眾還是崇尚儒術和經學的。曹操雖未明白地反對經學，排除儒術，但他嚴格的法治政策，好權術，嚴刑罰，禁誹謗，和不重視經學，尤其在幾次的求才令中，一次比一次露骨表示，他的用人唯才，而不計品德，明白地輕視儒家所最講求的孝悌節義，影響所及，較之董卓之亂，還要深遠得多。數百年來人們的精神依託，而今被曹操破壞了，他卻並沒有能夠拿出一套來代替它。在這動亂的時代，使得人們一方面是彷徨，沒有信仰，也無所依賴；另外一方面，卻也解脫掉數百年來思想上的鎖鍊和羈絆，人們開始可以盡量地去想，沒有人會來干涉。前此在獨尊儒術政策的陰影下，諸子之學不過是一道暗流，而今得以重見天日。學術思想自由的空氣，不僅帶給人們可以自由思想的權利，也帶給了人們自由思想、盡情思想、和創新思想的信心。

這是一個大轉變，由於這一個大轉變，不僅儒術經學喪失了它們多少年來的主流地位，而清談和玄學也由是興起。

兩漢的經學既有家法門戶，甚至有今古文之爭，爲了了解經師們經義的優劣，學識的高低，唯有透過比較，始有可能。早在東漢光武帝，已在正旦朝賀時，令羣臣能說經的，更相難詰。肅宗建初四年，更有白虎觀講論五經異同，相互論難的記錄。以論難爲手段，談論經義，可說是已有相當的歷史了。

而稍後，又產生了一股新的潮流，新的談論潮流，它是與論難全然不同的，也是全然沒有干連的，另外一種形式的談論。像符偉明的幅巾奮褒，談辭如雲；像孔公縉的清談高論，

噓枯吹生。他們所談的，是偏重於人物的品評，然而談論的本身，卻是文辭佳妙，音制精美，源源不絕，引人入勝。它所給予人的印象，自然也就特別深刻，而易於爲人所傳播了。

在某些事理的討論上，論難的方式是必須的，然而在趣味的保持上，以期獲得更多的羣眾上來看，美音制，是更爲有效的。辭清語妙的談論，雖談的是人物，而談論的本身，即爲顯示其人才能的一種。在重視學識才能的漢魏之交，美音制的談論，與乎論難的合流，是一個必然的發展趨勢，因爲如此一來，更可以表現其人的學識才能。而說經，則因經學失去了它本身在學術思想中獨占的地位，也漸次地轉而爲說理了。

而這也就是一般所謂的清談，它的另外一個名稱則是談玄。玄的意思是道，是天道、地道和人道。道的意思是理，是萬事萬物所以然的理。當我們理解到玄的意義時，才能認清這門學問到底是講的什麼。它追求萬物之所以然，追求萬理之所稽。它所講求的，只是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而不是天、地、人。道既是理，因之，玄只是要明其理，而不必明其事。現實的一切，對它來說，都是毫無意義的。

而玄的特點，不僅在它講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也在於它藉談論而進行，藉談論而建立。而在談論的過程中，推翻別人的，同時樹立自己的理論。因之，我們可以說，談論是求理的手段，而求理，則是談論的目的。就因爲玄和談論是分不開的，所以有的人稱這種談論爲談玄。當然，談玄是大有異於日常生活裏的談天說地，想到那裏說到那裏，不負責任的說，而是必須經過思考，加以組織，使它合乎邏輯，而不得自相矛盾，非但要推翻別人的理論，且須自立城圍，防備別人的來攻，談玄，自然而然地走上了論難的路子。它具備了以下

三個特點：

- (1) 它純粹爲求理而求理，不與現實的一切發生任何關係。
- (2) 它透過談論而產生，這種談論的實質是論難，論難所得的最後之理，只是最勝義，而非理源所歸。
- (3) 由於一切爲論難，技巧的受重視，漸次地超過內容，結果是不能，也不可能產生偉大的思想。

然而清談之所以爲清談，不僅由於它的本質是論難，它的目的在求理，也在於它講求辭清語妙。唯有透過辭清語妙，才能顯示論難之不完全等於清談，自也不能用論難之名來取代或稱呼清談。

清談的課題，一般說來，不出以下三點：

- (1) 書：如《易》、《老》、《莊》等，因爲這些書，具有足夠發人深省，復待闡發的有關天道、地道、和人道問題的存在，內容的豐富，可以供給各方面所需要的題材。
- (2) 注：如以上三書的注，這些注，雖對文義已有相當的闡發，尚可以作進一步的發揮；或賦予新義，而新義的本身，即屬一很好的課題。
- (3) 論：如才性四本、聲無哀樂等論。當然，從《易》、《老》、《莊》三書中某一點加以發揮，擴大推演，都可以成爲專論，甚且成爲名論，如《周易》的互體、老氏的無名、和莊子的逍遙。

此亦就是魏晉玄學的全部內容。《易》、《老》、《莊》三書雖然可以說是玄學的基本，在後